

東西對抗與德國統一問題

***** 葉陽明 *****

壹、前言

我國基於地緣政治的特性、傳統外交政策的導向、國際經貿關係的依存性以及人文學術的交流等因素，在過在三十多年以來與美國、東北亞的日本和大韓民國的雙邊關係極為密切；相對地與歐洲國家的關係——尤其是政治關係——則較為疏遠。由於我國對美與對歐關係上失衡，一般國人較少有機會觸聞歐洲事務，如此，國人對歐洲的認識和瞭解自然較為貧乏。若論及歐洲在世界局勢中的地位與角色，則更鮮為人所熟知了。

自從一九七九年初美國卡特政府承認中共政權、單方面斷絕與我國長年的正式外交關係以來，再加以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浪潮的起伏無定，在這種情形下，歐洲對我國而言，無論在任何方面皆益形重要。如果一般國人能夠透過學術界及大眾傳播界等的努力而增長對歐洲情勢的認知，則必有助於我國今後與歐洲國家新關係的拓展。

本文由三部份構成：首先概述歐洲在西方歷史及文化發展過程中扮演之角色；其次檢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處境和局面之改變；最後評析當今東西方之對抗情勢，並申論德國統一問題；結論中試從現狀預估歐洲未來情勢之動向。

貳、歐洲在西方歷史文化發展中之角色

一、歐洲之概念

對「歐洲」此一概念之理解有多方面不同之內容，各視其角度而定；吾人可分別從地理、哲學文化、政治、經濟各面向去解釋「歐洲」概念的內涵。譬如自地理角度，「歐洲」是全球五大洲之一，係亞洲大陸向西延伸所形成總面積達一千萬平方公里之

半島。古希臘大哲學家蘇格拉底（西元前四七〇—三九九年）理解下的「歐洲」僅含希臘半島。^①若從哲學文化角度觀之，歐洲乃西洋哲學思想、基督教文化孕育之搖籃。但若自政治角度看「歐洲」，則它是一個人種語言複雜、歷史久遠、政爭和戰爭頻繁、偶現和平，而當今却由卅多個部份已實現經濟統合、刻正追求政治整合的主權國家正進行東西對抗之地區。至於在字源學上，「歐洲」之概念最早根源於印度日耳曼語和希臘語以及猶太和腓尼基語。^②

二、歐洲之角色

歐洲係西方世界歷史文化發展的根源地。若無歐洲，則無悠久的西洋史及燦爛的西方文化，亦無昌盛之西方文明。歐洲不僅係西方文明之搖籃，並且亦形成了西洋歷史文化進展和變遷的主要活動空間。在這塊版圖還不及中國廣闊的地域上呈現過無數的王朝、帝國、衝突、戰爭、運動、改革、革命、王室權力鬭爭、國際權力平衡、黑暗時期及和平局面，諸此的總合塑造了數千年西方歷史文化的基礎與核心；亦曾孕育衆多的卓越哲學、宗教、政治、社會、經濟、教育思想家及文學、藝術、音樂家，彼等的思想體系博大精深、影響深遠，彼等的創造成就，輝煌燦爛、留傳萬世。舉其要者，前者如：亞歷山大帝國、羅馬帝國、神聖羅馬帝國、英吉利王國、法蘭西王國、漢諾威王朝、十字軍東征、英法百年戰爭、卅年戰爭、普法戰爭、政教衝突、光榮革命、法國大革命、產業革命、文藝復興運動、啓蒙運動、宗教改革運動、哈布斯堡與波旁王室的鬭爭、維也納會議後的權力均勢、第一次世界大戰等。後者如：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培根、康德、叔本華、尼采、盧梭、洛克、孟德斯鳩、黑格爾、韋伯、笛卡爾、狄爾泰、斐斯塔洛琪、哥德、席勒、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貝多芬、巴哈、莫札特、米開蘭基羅、畢卡索等。西洋歷史文化爲歐洲所主宰達十八世紀之久，直至一七七六年北美十三州發表獨立宣言、脫離英國殖民統治、藉贏得獨立戰爭之勝利以締造美利堅合衆國。自此，美國以新興強權之態勢參與了西方近代歷史及文化的形成。在歐美歷史文化的沖激和工業科技革命的推進下產生了近代西方社會之精神和物質文明。平心而論，美國民主法治基礎之奠立實應歸功於英國傳統代議民主政治之典範。若全無英國政治模式做爲參考和激勵，如何能在短促的兩個世紀裏孕育成功美國穩定的民主社會呢？

綜合前述，吾人可確言：歐洲在整個西方歷史文化形成、發展及變遷的過程中曾扮演一主導和核心的角色。透視當今，前瞻未來，該洲仍持續及將持續其舉足輕重之角色。

註① 參閱D. Kugeler, G. Gerhard, K-L Kley: *Die Europäische Einigung-Utopie, Chance oder Notwendigkeit*, München 1979, P. 8.
註② 同註①。

叁、戰後歐洲地位與情勢之改變

一、美國與歐洲不同之歷史命運

就國家處境與經歷方面而言，亞洲（尤其我國）與歐洲國家（尤其德國）頗為雷同，皆飽受戰爭、革命、動亂、分裂隔離之苦。位處太平洋東岸、大西洋西岸的美國却比歐亞兩洲幸運得多：它立國至今兩百餘年除南北內戰（一八六一～六五年）外，其本土並未曾遭遇任何外來武力的摧殘。正因如此，美國社會遂得於穩定局面之下不斷進步成長。附加以地廣物博、民主法治等主要因素致使美國成爲世界超級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形成的國際權力政治體系中，唯獨橫跨歐亞兩洲的蘇聯能與美國維持權力的抗衡。

反觀歐洲，在本世紀前半期，短短的卅幾年之間，其本土即蒙受兩次史無前例的劫難：第一次（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和第二次（一九三九～一九四五年）世界大戰。這兩次戰爭的發動者均係厲行軍國主義擴張政策之德意志帝國。自然，德國人爲彼等的侵略行動在戰後付出了極大的代價：第一次大戰德國戰敗後德人屈辱於「凡爾賽和平條約」（Versailles-Vertrag）之下，而却造成希特勒瓦解威瑪共和、奪取政權和建立「德意志第三帝國」之機會；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家社會主義」掛帥的納粹德國戰敗，無條件投降後德國分裂爲東西兩半部，東、西德分別在蘇聯與美、英、法西方三國幕後支持下各建立了共黨政權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與民主法治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自此德人飽受國家分裂、民族隔離之困。

二、戰後的歐洲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歐洲淪於體無完膚、摧毀殆盡的局面。戰敗的德意志固然分崩離析，奧地利亦被盟軍分區佔領統治，而戰勝國如英、法等亦在政治、社會和經濟秩序方面迅速重建。正當歐洲因戰亂而元氣大傷，於戰後力圖復興、重振國力之際，本土未遭戰火侵襲仍握有強大國力的美國以及雖遭侵襲然未被慘重破壞的蘇聯，却趁此千載難逢的時機，積極發展高科技、建立現代化的國防軍備武力。經戰後至今卅多年來的努力，輔之以人力、物力、資源等方面的優越條件，美蘇兩國在科技進展和武器革新上已遠遠凌駕歐洲各工業先進國家之上，而居於世界主導和霸權的地位。相對地，歐洲於現代史的歷程中，尤其自戰後，由於致力於復建，科技未及美蘇進步，國力未及兩國強大而盡失其在歷史上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縱使吾人不敢斷言歐洲已趨沒落，但其原有之世界主宰地位無疑已爲美國與蘇聯所取代。若不以科技進展及武力現代化程度

來論，而另就學術文化等精神活動方面觀之，則無可否認，歐洲仍是世界的重心。

論及當代與歐洲相關之國際政治情勢，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美蘇所持國家基本利益相同——皆欲粉碎納粹德國——故儘管兩國在政治、社會體制和意識形態上極端對立（民主與共產），却依然結盟合作。一國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基本上不以意識形態，而以國家決策階層當時鑑於情勢所設定的國家利益為主要導向。再者，利益相同的兩國易於形成結盟關係，俾實現共同之目標。戰後，希特勒政權瓦解，美蘇已無共同利益及合作之基礎，兩強於各圖擴張在歐洲的影響力之下，彼此遂各立陣營，進行政治和軍事策略性的對抗。自此，政風保守、歷史悠久、文化昌明的歐洲竟不幸淪為美蘇兩強權力角逐、利益衝突的紛爭場所。德國的分裂不僅意味東西德的對峙，同時更表徵著東西陣營長期鬭爭對抗、短期和平共存的具體形式，因為在波昂與東柏林政權之後分別有美蘇兩強做為支柱。若美蘇關係呈現緊張，則東西德關係因受其影響而難於和解；反之，若華盛頓與莫斯科關係趨於緩和，則東柏林與波昂關係將不致惡化。基本上，東西德之關係是在美蘇所主導的東西陣營關係之大前提下進展的。兩者間形成微妙的交互作用。

肆、評析當前東西歐之情勢

如前段所述，戰後迄今之世界局勢，本質上係以美蘇兩超強間之緊張或和解關係為核心，在東西方工業進步國家及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部份或為「不結盟國家」）共同參與之下，所構成的全球情勢。戰後歐洲既然成為美蘇在全球衝突對抗的主要場所，則歐洲各國必然無法擺脫兩強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和左右。

一、東西歐在軍事上之對抗

戰後初期，東西歐國家在美蘇領導下分別建立了軍事防禦性結盟體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與「華沙公約組織」（華約）。北約於一九四九年四月基於「布魯塞爾條約」（一九四八年）和「杜魯門主張」簽約組織而成。當時十二個成員國中除美國、加拿大外其餘皆為北西歐或南歐國家，計有：大不列顛、法國、比利時、丹麥、冰島、義大利、盧森堡、荷蘭、挪威及葡萄牙。其後基於自願或迫切需要而加入者有西德、希臘及土耳其。目前北約組織合計十五國，但法國和希臘未參與北約純軍事性的組織。③在西德加入北約、重新武裝（依「巴黎條約」）的刺激下，東歐國家基於「莫斯科會議」和「華沙會議」的決議，

註③ Gerhard Weher: "Die Entstehung der beiden Bündnisse", in: *Nordatlantikpakt, Warschauerpakt-Ein Vergleich*, München 1980, pp. 70-71.

於一九五五年五月簽約組成「華沙公約組織」。當時華約諸成員國中除蘇聯外其餘皆屬東歐或東南歐國家，計有：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東德、波蘭、羅馬尼亞及匈牙利。其後，阿爾巴尼亞因親近中共，遠離蘇聯而退出組織。^④從實際政治而言，北約和華約兩結盟體系是美國與蘇聯在歐洲及北大西洋地區進行軍事對抗的主要工具。在軍事上實力較弱、自主性較低的東西歐國家當面臨美蘇武力角逐時，僅能扮演次級和依附體系的角色。就區域穩定及國防安全而論，西歐各民主國家一方面須仰賴美國軍備武力的援助，另一方面須主動支持美國的軍事行動和積極參與北約組織的防禦任務。反觀，東歐共黨國家除依賴蘇聯軍事上的協助外，還須接受蘇聯之領導、附和蘇聯的軍事步驟，並投入華約組織的防禦陣線，以謀集體之安全。然可確認者，祇要華約集團在戰略上仍採守勢，北約成員國絕不可能主動攻擊，因為自由民主的國家比社會主義的國家更企望和平、穩定和安全。

二、東西歐在經貿上之對立

東西歐之對峙不僅出現於軍事範疇，同時亦呈顯於經濟範圍。「歐洲共同體」與「經濟互助委員會」的對立襯托出東西歐在經濟上的對抗關係。「歐洲共同體」係一九六七年由「歐洲經濟共同市場」、「煤鋼聯盟」及「歐洲原子能組織」合併構成。其主體「歐洲經濟共同市場」係早先於一九五七年三月，基於西歐國家政治整合計劃的受挫和經濟統合的必要性，由西德、比利時、法國、義大利、盧森堡及荷蘭六個創始成員國在羅馬簽署「羅馬條約」，組織而成。^⑤共同體隨後有英國、愛爾蘭、丹麥（一九七三年）、希臘、西班牙及葡萄牙（一九八六年）等國的加入，今成員國總數合計十二國。^⑥「歐洲共同體」經其成員國過去三十年的努力，業已實現經濟和貿易範疇的合作目標如：自由貿易、關稅聯盟、共同農業市場、共同貿易政策、貨幣聯盟等。該組織力圖實現的最終目標，是透過西歐各國經濟整合的途徑以達成歐洲政治的統合，俾完成「歐洲合眾國」之理想。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四年「歐洲議會」（共同體的諮議機構）的直接選舉正是邁向此目標的第一大步。「共同市場」委員會的首任主席德籍的哈爾史坦（Walter Hallstein）曾將經濟整合視為政治統合的關鍵因素，其意義極為深遠。^⑦

與「歐洲共同體」遙相對立的「經濟互助委員會」係東歐及東南歐社會主義國家組成的國際經濟合作組織。它早在一九四九年初基於蘇聯對東歐共黨國家戰後經濟援助的構想（東歐的馬歇爾計劃），而在蘇聯創議下由蘇聯、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

註④ 同註③，頁七四—七五。

註⑤ Elke Thiel: *Die Europäische Gemeinschaft-Zwischen Krise und Bewährung*, München 1977, P. 11.

註⑥ Heinz Stadmann: "Die Süderweiterung der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 in: *Europa Archiv-Zeitschrift für Internationale Politik*, Folge 5 1986, pp. 129-136.

註⑦ Walter Hallstein: *Europäische Reden*, Stuttgart 1979, p. 243.

尼亞及保加利亞六國組織而成。其後阿爾巴尼亞、東德（一九五〇年）及外蒙古亦相繼加入。但阿爾巴尼亞後來因與蘇聯衝突，自六〇年代之後已不再派遣代表出席會議。③事實上，蘇聯對東歐各國經濟之援助，乃以達成政治控制為主要考慮，提供經濟援助為次要目的。其意乃指，蘇聯意圖藉經濟支助東歐的手段，俾實現政治上主宰諸國，使成爲其附庸之目標。④吾人若把相互對立的「歐洲共同體」與「經濟互助委員會」做一比較，則不難瞭解兩者根本不同之處：前者在無美國介入之下各成員國進行地位平等的經濟合作；然而後者在蘇聯單方的導控之下各成員國維持對蘇聯主從式的經濟關係。

三、歐洲安全合作會議——東西和解之形式象徵

在現今世界局勢與東西歐形勢發展的過程中，值得重視者是表徵東西關係和解的「歐洲安全合作會議」（簡稱「歐安會議」）。「歐安會議」係由蘇聯創議，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八月之交，由全歐洲（除阿爾巴尼亞）及北美國家總計卅五國假赫爾辛基簽署「結尾文件」組織而成。⑤該組織的宗旨及各會員國間關係的指導原則皆確立於結尾文件中：就宗旨言，在於謀求安全問題之解決，經濟、科技、環境之合作、人道及其它範圍之交流合作；就原則言，則基於各國主權平等之尊重、暴力脅迫之放棄、國界之不可侵犯、各國領土完整之尊重、爭端之和平排解、內政之不可干預、人權和基本自由之尊重、民族平等權和自決權之尊重、國際之合作以及國際法義務之履行十項。⑥

「歐洲安全合作會議」應被視爲美蘇及歐洲所有國家共同追求國際安全與洲際合作的進程。從蘇聯早在一九六六年即建議組織一歐洲安全會議、歷經各有關國家無數回合磋商談判，至一九七五年夏始組織成功的角度觀之，此一進程是百經波折又漫長的。形式上，它反映出洲際實現世界和平的努力。至於蘇聯創議之主要動機則在於欲鞏固歐洲現狀。

卅五個會員國鑒於「歐安會議」後續的必要性，遂在內容豐富的「結尾文件」末端聲明：與會各國皆有決心去持續因該會議而導入的安全合作之新進程。除此而外，文件中還包括所謂「形成互信暨裁軍」等措施。⑦自一九七五年「結尾文件」簽署迄今

註③ Hartwich, Horn: *Politik in 20 Jahrhundert*, Braunschweig 1967, Pp. 443-444.

註④ Werner Bröll: *COMECON*, München 1975, P. 11

註⑤ Wichard Woyke (Hrsg.): *Handwörterbuch Internationale Politik*, Opladen 1980, Pp. 217-218.

註⑥ 參閱 Hermann Volle u. Wolfgang Wagner (Hrsg.): *KSZE-Konferenz über Sicherheit und Zusammenarbeit in Europa-in Beiträgen und Dokumenten aus dem Europa-Archiv*, Bonn 1976, Pp. 237-243.

註⑦ 同註⑥，頁二八三～二八四及二四五～二四八。

前後十餘年，絕大多數與會國的確以實際行動來證明彼等在文件中所確立之決心，如：一九七七年「貝爾格勒(Belgrad)」後續會議、一九八〇年十一月「馬德里後續會議」、一九八四年一月「斯德哥爾摩歐洲互信暨裁軍會議」及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維也納後續會議」之召開。

然自批評角度來看，縱使會員諸國藉「歐安會議」及其「後續集會」的組織形式，以致力實現地區之安全穩定與國際之和平合作，但由於各國彼此的政治、社會體制和意識形態不盡相同，且國家處境和現實利益又頗有差異，故「歐安會議」所企求之理想甚難圓滿達成，久而久之，不免流於空洞形式而已。就以蘇聯始終罔顧人權、干涉阿富汗內政而論，根本上已使「歐安會議」結尾文件之原則與精神蕩然無存。

另從美蘇於七、八〇年代在東西歐分別部署中程核子武器（美國部署潘興二型飛彈和巡弋飛彈；蘇聯部署SS-20型飛彈），且藉研究發展「戰略防禦計劃」（又稱星戰方案）以進行太空軍備競賽來看，此兩超強基本上缺乏謀和的誠意。這事實亦為美蘇「裁減軍備談判」和「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一再破裂的主要原因。若美國與蘇聯依然故我、東西核子僵局仍未能突破，則在可預見的未來，「歐洲安全合作會議」將成爲一歷史名詞，幾乎無現實政治的實質功能和意義。

四、對抗情勢中的德國統一問題

在亞洲，中國及韓國分裂；在歐洲，德國係唯一分裂中的國家。謀求實現國家的重新統一無疑是分裂中國家所設定的最高目標。東西歐對抗與和解情勢中的德國統一問題，對歐洲乃至於世界政局而言，誠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爲當今歐洲之分裂其根本原因在於德國之分裂，德國問題能否獲致最終有效之解決，將深遠地影響未來歐洲和世界局勢之穩定。此處所謂的「最終有效之解決」自然是指德國循自決之途徑統一於自由民主的體制之下。

如前所述，德國於戰後一分爲二，形成東西德民主與共產兩政權對立共存的局面。德國的分裂基本上乃戰後美蘇權力對抗、利益衝突的產物。基此，「德意志第三帝國」——繼威瑪共和國之後的「國家社會主義之德國」——未能於戰後持續本身的統治政權，國家統一被破壞，主要原因是戰爭的潰敗和接踵而至的國際政治環境的壓力。大體言之，德國的分裂是由外力所使然。

自一九四九年九月德國分裂成定局，波昂與東柏林政權對峙以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俗稱西德）政府曾循各種和平途徑，力圖實現德國再統一之目標。反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俗稱東德）在受蘇聯導控下逐步排除未來統一的可能性。雙方在德國統一問題上的行爲表現受到當時國際局勢及國內環境雙重因素羣之影響，茲扼要析述如後。

1. 西德政府對德國再統一的追求

做為西德立國基礎的「基本法」賦予全德意志民族一項莊嚴的歷史任務，即該法序言中所稱之：「務望吾全體德意志人民依自決完成德國的統一與自由」。同時，序言指出德人之心志：「各邦之德意志人民意識到其對上帝和人類所負之責任，決心維護其民族與國家的統一。」¹³ 既往卅餘年，西德歷任執政者皆以前述任務為導向，謀解決德國統一問題。至於在相關策略和手段的運用方面，則因各執政者的政策取向及國內外情勢的演變而見仁見智。¹⁴

艾德諾時期

西德首任聯邦總理艾德諾 (Konrad Adenauer) 視強化國家外交能力並增進與西方各國關係為西德主要目標，而實現德國再統一為次要目標，因為依艾氏之見前者較後者更重要。艾德諾任職初期設法延擱美、英、法、蘇有關德國統一問題之談判，由於艾氏深恐各國可能達成德國中立化或永久分裂之協議，如此則自決方式的統一永無指望。五〇年代前半期，西德逐步與西方國家整合，其目的在循此途徑以要求各國協助西德達成德國統一。波昂的聯邦政府在艾德諾領導下，堅持其為德國統一前唯一代表全德人民的主張，否認東德政權的合法性。一九五五年的「哈爾史坦主義」(Hallstein-Doktrin)¹⁵ 乃西德堅持其主張之手段。艾德諾執政 (一九四九至六三年) 末期因對西方各國失去信心而試圖單方面與蘇聯就統一問題進行談判，並謀透過中間機構與東德片面接觸。¹⁶ 該行為顯示，艾氏原先的強硬立場經數年間國內外環境的激盪而有所調整，調整者為手段，非目標。

歐哈德時期

歐哈德 (Ludwig Erhard) 繼艾德諾之後，仍持不承認東德之政策。但歐氏確信，東西陣營長期對抗後實有和解之需要，而和解之先決條件即為德國之統一。基此，外長史略德 (Gerhard Schröder) 設計所謂「機動政策」。這種具突破性的政策以西德與東歐國家進行關係正常化、緩和對東德關係、促成德國再統一為目標。由於機動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在於建立和維持西德與蘇聯及東歐國家 (包含東德) 的友好關係，故經具體化後被名為「東鄰政策」(die Ostpolitik)。¹⁷

註¹³ 參閱 Gottfried-Karl Kindermann: Nationalismus als außenpolitischer Motivationsfaktor, in: G. K. Kindermann (Hrsg.): *Grundelemente der Weltpolitik*, München 1981, P. 297.

註¹⁴ 參閱 Peter Juling: "Koninuität im Ziel- Aber Wandel des Weges", in: *Deutschland Archiv-Zeitschrift für Fragen der DDR und Deutschlandpolitik*, September 1983, P. 920.

註¹⁵ 「哈爾史坦主義」聲明：西德政府係德意志人民唯一之合法代表機構，任何已與波昂建交而後却承認東柏林的國家皆被波昂視為對西德不友善之邦，波昂將採取一系列因應措施，斷交屬其中之一。

註¹⁶ 參閱 Hans-Peter Schwarz (Hrsg.): *Handbuch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München 1975, Pp. 587-605.

註¹⁷ 同註¹⁶，頁六〇七。Richard Woyke: 前揭書，頁一九八。

凱辛格時期

歐哈德內閣（一九六三至六六年）及其接替者——凱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的「大聯合政府」——採取前述新路線，俾求實現統一。此種外交作為一則受六〇年代以來國際和解潮流之影響；再則係一種鑑於過去艾德諾政策成效不彰，而轉尋新途徑以化解東西僵局的學習行為。在「東鄰政策」的導引下，「哈爾史坦主義」已失去其原來之意義。^⑧

正因東鄰政策之貫徹，西德逐漸突破外交孤立，並改善了它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關係。同時，波昂在世界政治舞臺上所扮演的角色亦轉變為東西對抗勢力間之橋樑。

布朗德時期

六〇年代末期，西德聯邦執政權從保守的「基督教民主社會聯盟」移轉入「社會民主黨」。該黨主席布朗德就職總理後便全面拓展與蘇聯及東歐之關係，並主動與東柏林接觸和談判。一九七二年底的「東、西德關係基礎條約」之簽訂即為談判之結果。^⑨依該項條約，布朗德政府承認了兩個基於平等地位交往的德國的存在。此一空前性的步驟與布氏本人自一九六九年任職後一再重申不放棄德意志民族自決之權利及國家統一之目標頗相矛盾。^⑩此種矛盾現象暴露出當時政府決策階層進退兩難的處境：波昂須從現實角度肯定東柏林政權之獨立存在，並承認東德享有主權國之平等權利和地位；然同時鑒於「基本法」所賦予的使命，故又無法捨棄西德立國以來堅守的德國統一目標。布朗德政府採行的所謂「新東鄰政策」雖導致東西德關係益趨密切、迫使蘇聯及東德放棄運用暴力以解決爭端；但由於承認了兩個德國的存在，致使再統一更難達成。

施密特時期

施密特（Helmut Schmidt）繼布朗德之後持續「社民自民聯合政府」的德國政策：即不追求過高的理想，而從現實觀點考慮，設法於分裂的現狀中儘量維繫東西德人民的結合性。施氏具體的路線是一方面強化西德與西方盟國的團結力；另一方面以既訂「東鄰條約」為基礎繼續拓展對蘇聯、東德及東歐其它國家之關係。施氏認為，德意志民族唯有在歐洲呈現長期和平時，始得循自決完成國家統一。^⑪至於針對東柏林的「劃界行為」，西德政府為顧全大局，不施予報復。^⑫長達八年（一九七四至八二年

註⑧ 參閱G. K. Kindermann, 前揭書, 頁二九八。

註⑨ W. Woyke, 前揭書, 頁六一。

註⑩ 參閱H. P. Schwarz, 前揭書, 頁六一二。

註⑪ 參閱P. Jüling, 前揭書, 頁九一四。

註⑫ 同註⑩。

的執政期間，施密特政府力行其所稱之「條約政策」，為後繼的柯爾政府鋪設德國政策之路軌。

柯爾時期

一九八二年十月更替社民自民聯合政府的柯爾（Helmut Kohl）政府，除在原則上續行前述路線外，同時還欲貫徹符合全人類利益的「積極和平政策」。柯氏相信，謀分裂問題之解決唯有自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着眼，且改善東西德關係之際須顧及全德人民及歐洲人民之利益。就實際步驟論，柯爾政府繼續與東德接觸和談判。並與東柏林達成有益於德人的長期協議（諸如文化協定等），藉以減低德人因分裂而形成的困擾，使現狀對人民而言仍堪忍受。依柯爾的觀察，東西德距實現條約中所確立的「關係正常化」之目標仍甚遙遠。^②

事實上，自柯爾領導的「基民自民中間聯合政府」執政後，東西德關係却呈現某種程度的疏離現象，主因在於保守的「基民社聯盟」向來秉持親美反蘇的基本立場，不欲與東德進行緊密的交往。於一九八七年元月廿五日第十一屆聯邦議會選舉中再度贏得勝利的柯爾雖重申其持續拓展對東德關係之決心，然礙於該黨之保守立場未改，目前兩德間的疏離局面料難突破，若謀統一之實現，猶如空中樓閣之不可期。

2. 東德政權的反統一行為

史實顯示，東德在蘇聯導控下自政權成立迄今所表現之行為是逐步反統一的。初期，東德透過其首部憲法強調德意志的統一性和完整性。^③

東德加入華沙公約組織之前，東柏林的德國政策取向見於各項不同的建議中。這些建議之要旨在謀求德國問題全面性之解決。當時東德總理葛特渥（Otto Grotewohl）提議：設立一由東西德等額代表組成之「全德理事會」，俾籌組「全德臨時政府」。此議却遭西德政府以要求自由普選為理由而被拒絕。^④

一九五四年——史達林亡後的次年——東德的德國政策因它與蘇聯關係的調整而邁入一新階段。同年三月莫斯科單方宣稱：

註② 德國Rupert Scholz: *Perspektiven der Deutschlandpolitik*, in: *Deutschland Archiv*, März 1984, P. 258. P. Juling. 前揭書，頁九二五。

註③ 德國G. K. Kindermann. 前揭書，頁九二五。

註④ Bayerische La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sarbeit (Hrsg.): *DDR das Politische, Wirtschaftliche und Soziale System*, München 1981, P. 34.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享有完整之國家主權。東柏林遂趁機聲明：東德與蘇聯及其它國家維持一般主權國家間之平等關係。²⁰在策略運用下，東德試圖使自身成爲主權國，藉此踏出排除德意志統一的第一步。

自五〇年代中期始，蘇聯公開反對德國統一，却主張兩德國成立「邦聯」。東德遂有恃無恐，於討論德國問題的國際會議上反覆利用「兩個德國之理論」以辯護本身的立場。²¹在一九六一年東德構築「柏林圍牆」前，其德國政策係以「兩德國邦聯」之設計爲取向。東德所持「兩德共存」之論調自然無法獲西德官方之承認。

六、七〇年代間東德積極從事所謂的「社會主義全面建設」。據東德掌權者——「社會主義統一黨」宣稱：柏林圍牆之樹立有助導東德社會主義體系內部穩定之功能。²²無疑，東柏林藉此種反人性的措施再度否定了德國統一之可能性。

依社會主義建設階段結束時所頒行的第二部憲法，東德乃一「德意志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²³首部憲法中所標示的「民主共和國」字樣已不復存在。基此，東德是持「一個德意志民族、兩個德國」之論調。

東柏林從一九七〇年後態度急劇轉變，公然駁斥「一個德意志民族」的說法。次年，霍內克(Erich Honecker)繼鄔利希(Walter Ulbricht)出掌「社統黨」總書記。霍氏自此提出「兩個德意志民族」的論調，意圖藉以鞏固東德原主張的「兩個德意志國家」之理論基礎。²⁴依東柏林領導中心之見，社會主義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與「帝國主義」²⁵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之間沒有統一，且亦無法統一。

伍、結 論

歐洲在當今二十世紀的歷程中(尤其自戰後)，受前述種種因素之限制，已逐漸失去其原本的地位和光彩。然而正由於歐洲具有歷史、文化及傳統的紮實根基，又由於該地區當前及未來是美蘇兩強全球性爭霸的政治軍事重心，是故歐洲在今後世局的演變中仍將扮演益形重要之角色。吾人檢視當今歐洲情勢，預估未來發展，可歸結如後：

註²⁰ 同註¹⁹，頁三五。

註²¹ 同註²⁰，頁三七。

註²² 同註²⁰，頁四四。

註²³ 同註²⁰，頁四六。

註²⁴ 同註²⁰，頁四八。

註²⁵ 東德視實行資本主義體制的西德爲帝國主義之國家。

(1) 未來歐洲反美勢力將日益趨強。無疑，美國係富理想、有使命感的一等強國。但歷史經驗也顯示，美國本其既定政策及國家利益、主動或被動介入某地區後，對該地區的安全與穩定或許有所貢獻，但未必全然是福。譬如：戰後馬歇爾調停中國內爭，致使中共坐大；六、七〇年代美國參與越南戰爭，導致阮文紹政府淪亡、越南被赤化。西歐國家部份朝野人士鑒於美國在過去政策上的種種誤失，又未能洞察歐洲之國情，故認定美政府介入歐洲事務、美軍駐防西歐，結果祇會攪亂該地區的政局，甚至引發未來歐洲本土的核子戰爭，屆時歐洲淪為焦土，而美國却仍可退守其太平洋東岸的本土。基此，核戰威脅愈大、裁軍談判愈陷僵局，則西歐人士反美、仇美的聲浪也愈高。在蘇聯藉宣傳以推波助瀾之下，未來西歐反美勢力將趨強。以各歐洲綠黨和反戰反核人士為中心所推動的「和平運動」亦將日益活躍。

(2) 歐洲意識抬頭，西歐積極邁向政治統合。近年來，西歐主要工業國（英、法、西德）和「歐洲共同體」在外交行動上不盡然與美國同步調（如：經濟制裁南非、軍事懲罰利比亞、參與「星戰計劃」等）。此外，自一九七九年起「共同體」的諮議機構——「歐洲議會」，突破往例，採行由成員國人民直接選舉之方式。從這兩方面可判斷，歐洲意識刻在逐漸提升之中。所謂「歐洲意識」可指歐洲人不分國籍、跨越國界的共同體意識；彼等認定，歐洲係一完整統一的單元、歐洲人榮辱存亡命運的共同體。簡言之，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無可否認，歐洲意識的抬頭必能加速推動西歐各國邁向政治統合的最終目標。

(3) 德國統一為歐洲問題解決之關鍵：儘管西德單方面努力，然無東德的配合，仍無法突破僵局。加之，美英法三國當前基於歐洲權力均衡的考慮，今後可能仍將設法維持歐洲權力分配的現狀。此種局面更不利於德國的再統一。

但以長遠眼光來看，德國統一確是歐洲問題解決之關鍵。德國的分裂情勢持續一日，則歐洲之和平與穩定也一日無法實現。當年造成德國分裂的美、英、法、蘇四國理應正視此重大問題癥結之所在，為謀歐洲及世界之和平，暫先捐棄己國的個別利益和成見，共同尋求統一德國之方案。

（本文作者現為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